

幽隐贡献：当“贡献必须被确证”失效之后

——确证装置照不到的地方，贡献从未停止发生

王德生 · 德麦国际 · 2026年7月17日

摘要

当代围绕AI与创作贡献的讨论正陷入一个定义竞赛——各方努力重新界定“贡献”，却在共享一个未被质询的先验：贡献必须被确证。本文不参与这一定义竞赛，而是对竞赛本身进行一次二阶诊断，追问这一先验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其制度基座当前如何被AI系统性地撬动，及其失效意味着什么。本文的核心判断是：能够被确证的贡献只是贡献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现身形态；确证装置的运转，始终依赖着一片不可归因、不可度量、不可追认却构成一切创造性文明底色的发生基底——本文称之为“幽隐贡献”。它不是在确证光照不到的暗角等待被发现的对象，而是任何确证行为所必须预设却无法穿透的发生条件。AI时代的的确证装置失效因此不是“贡献的危机”，而是确证先验本身的历史性被暴露的时刻——这为人类重新看见并自觉承认幽隐贡献的文明生态，打开了一种并非怀旧的历史可能性。全文论证幽隐贡献的概念有效性，将其与后结构主义的“作者之死”与“互文性”命题进行严格的不可还原性对话，并以一所虚构的“幽隐大学”为贯穿性的思想实验，在确证装置全部悬置的极端条件下，逼出幽隐逻辑的运行形态与内在困境。文末正面处理“资本捕获”的规范性挑战，并给出证伪条件。

关键词：幽隐贡献；确证先验；AI创作；不可归因；不可追认；作者之死

一、从确证失效走向二阶追问

2023年，美国版权局审理了一位作家为AI辅助创作的漫画书申请版权的案件。当事人坦承书中图像由Midjourney生成，但坚称自己对提示词的反复打磨、从数百张生成结果中的精心筛选与编排，构成了她作为作者的创作贡献。版权局最终裁定：AI生成的图像不受版权保护，但人类编排的文本与图像的选择和组织方式可以。这个裁决留下了一道裂缝。这不是一道可以随着法律条文完善而弥合的裂缝，而是一道一旦被撬开就会持续扩大的裂缝——因为在它的底下，有一个尚未被说穿的先验：贡献必须被确证。

本文试图追问的，不是“如何在AI时代重新定义贡献”，而是这个追问本身所立足的那片未经质询的地基。“贡献必须被确证”究竟是如何成为一条自明的前提的？确证——追溯到一个可辨识的人类主体、一段可叙述的创作过程、一个可度量的技艺投入、一种可保护的法律身份——为什么会被等同于贡献本身？当这套确证装置在AI的冲击下开始系统性失效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贡献的消失，还是确证这一特定的历史建构的退场？

本文提出一个核心判断：确证贡献只是贡献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现身形态。在它之下、之外、之前，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归因、不可度量、不可追认却构成一切创造性文明底色的贡献方式——本文称之为“幽隐贡献”。它不是贡献的另一种类型，仿佛在确证贡献之外还有一种“不可确证的贡献”，可以并列于贡献的目录之中。它是贡献的另一种存在形态：确证贡献指的是那些可以被追溯、被度量、被归属的可见结构；而幽隐贡献指的是使这些可见结构得以发生的、不可被追溯、不可被度量、不可被归属的发生过程本身。

这一区分的直觉基础极其朴素。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确证贡献只是非常晚近的发明。印刷术使追溯原作者成为技术上可行的事，浪漫主义运动将创作从手艺活重新解释为天才的灵魂表达，资本主义版权法将“原创性”确立为可被断权的法律身份。这套基座运转了数个世纪，以至于我们逐渐忘记了它的历史性，而把它当作贡献的唯一形态。在它尚未建立之前，人类最深刻的创造——语言、工具、农业、神话、音乐的调式、建筑的母题——都以不可归因于任何个体的方式发生。没有人知道是谁发明了轮子，是谁最先画下洞穴里的野牛，是谁在某个黄昏把麦粒磨成粉、与水揉成面团。这些贡献的巨大程度，使得整个人类文明都建立在它们之上；而它们的不可确证性，不是技术的局限，而是确证这个概念在文明的尺度上天然具有的边界。

AI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发明不可确证的贡献——它只是让确证装置第一次遭遇了系统性的失效。当训练数据中溶解了无数被遗忘的创作痕迹，当“创作”被压缩为“输入提示—接收输出”的短促回路，当劳动轨迹的可追溯性、制度性认可的有效性、创作者内在确证感的可靠性三根支柱被逐一撬动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制度故障，而是一个需要被辨认的时刻：确证装置本身的历史性，第一次变得不可忽视。

本文的任务就是辨认这一时刻。全文论证路径如下：第二章处理目前关于AI与贡献困境最具穿透力的诊断——即“贡献者黑

洞”论述——并对该诊断自身进行二阶追问，揭示其尚未质询的确证先验。第三章追溯确证先验的发生史，追问它为何能成为对贡献的默认语法，以及它的制度基座如何在AI冲击下暴露其内部本已存在的张力。第四章正式提出幽隐贡献的概念，在将其与隐性知识、涌现理论切割之后，以专门一节正面处理它与后结构主义“作者之死”与“互文性”命题的不可还原性对话——这是本文概念论证最关键的学术战场。第五章引入一所虚构的“幽隐大学”作为贯穿性的思想实验，在确证装置全部悬置的极端条件下，让幽隐逻辑的形态与内在困境从缺席中自行浮现。第六章正面回应资本捕获的规范性挑战，并注入幽隐贡献的伦理内核。文末给出证伪条件。

二、确证先验：一场对既有诊断的二阶追问

（一）已有诊断完成了什么

在本文开启自身的论证之前，需要先承认已有诊断已经完成的实质进展。当前关于AI与贡献困境的讨论中，最具穿透力的一族诊断，分别以“策展人转向”“冗余守护论”“责任路由化”为代表；本文把这族诊断的共同深层逻辑概括为“贡献者黑洞”——需要立即说明，这一概括是本文自己做的合成（注[1]），不指涉某一篇特定文献。合成的目的只有一个：先替这族诊断说出它们最强的版本，再对这个最强版本做二阶追问。在其最强版本中，这一诊断完成了三项有分量的工作。

第一，它识别出AI时代三种重建贡献的方案——策展人转向、冗余守护论、责任路由化——各自的有效性与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策展人转向将贡献从“产出端”回撤到“输入端”，主张提问与筛选构成新的贡献核心，却暴露了策展动作与AI优化逻辑共享筛选淘汰内核的紧张：当AI也在学习如何更好策展时，人的策展还能在什么意义上构成贡献？冗余守护论指出原创性深植于那些无法被优化的个人经验冗余，却揭示了一个时间性悖论：一个人此刻的精准策展能力，依赖的是他过去未经策展的冗余经验；而他此刻的精准策展，正在剥夺未来那个自己去进行同样未经策展的探索的机会。责任路由化试图用伦理担当锁定贡献的锚点，却暴露了框架本身的价值中空——任何价值取向的行动者都可以完美地执行这套规程。

第二，它论证了这些矛盾不是可以被更精致的理论综合所消化的，而是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结构。AI对传统贡献的制度基座——署名、版权、原创性认定——的消解，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引力场。所有重新定义贡献的努力，都因为试图在这个引力场内划定边界，而被吸进视界、转化为系统自我壮大的燃料。

第三，这族诊断中最自觉的版本已经意识到，定义竞赛本身就是问题，并愿意为自己的判断预设失效条件——这份诚实，恰恰为本文的二阶追问提供了立足点。

这三项工作构成了本文无法绕过的前提。本文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意识到定义竞赛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诊断。这意味着，本文必须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诊断本身，是否还站在一片它尚未质询的地面上？

（二）诊断自身的确证先验

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一诊断的核心判断：人类正在围绕一个价值中空的评价结构——以效率和能力为边界——进行越来越精致的、却无法抵达核心的讨论。所有对“新贡献”的重新定义，都会被吸进这个结构的引力场。它吞噬一切传统贡献的确证形式，禁止任何内在的“价值”从中逃逸。

现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贡献无法被确证”是危机？为什么“吞噬”被体验为吞噬？如果贡献从来就不依赖于被确证，那么确证装置的失效，为什么会构成困境？

这套诊断的回答，隐性地、但确凿地预设了：确证的失效，是一个需要被诊断的困境。它的引力之所以被感受为吞噬，是因为我们在意那个“无法被确证”的状态。这诊断在说：我们困住了——我们想要确证贡献，但结构性地无法确证。这种被困住的体验是真实的。但它是从哪个角度望出去被看见的？从确证之光的角度。是一双习惯了被照亮、把被照亮等同于存在的眼睛，在光线突然减弱后，首先感到了黑暗的压迫。

现在，如果往前再推一步。如果确证的失效不是一个危机，而是一次被迫的、痛苦的觉醒？如果被吞噬的，从来不是贡献本身——那些在创作过程中真正发生的、改变创作者也通过创作者改变世界的发生过程——而只是贡献的确证形式（署名、版权、追溯性、可量化的影响因子）？如果这个系统所禁止逃逸的“价值”，只是“可以被指认为价值、将其归因于某个主体、量化为某个指标”的确认之光，而那真正的、无法被指认的、从发生过程中散逸并沉淀为文明厚度的幽暗之热，从来就不需要、也无法被任何确证系统所捕获？

这些追问不是在否认该诊断所描述的困境的存在。版权确实在失效，署名确实在变得可疑，创作者确实在经历身份焦虑。但

这些追问指出的是：“黑洞”这个命名，是对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确证装置失效的诊断，而不是对贡献本身的命运的诊断。贡献是否能够、是否需要被确证，与贡献本身是否发生、是否深广，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把它们混同起来，本身就是确证先验的效力——它让我们以为：如果某件事不能被确证为贡献，那它就不是贡献。

那么，这个诊断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把AI时代的贡献困境诊断为“吞噬结构”，这个诊断话语本身是在什么条件下、经由怎样的概念路径被发生出来的？它是不是也是那个试图用探照灯照亮一切、控制一切、收获一切的现代性惯性，在探照灯突然失效后，面对自己无法再照亮的那片区域，因无法忍受“看不见”而投射出的一个恐惧之名？那种吞噬性的感受，是否正是那个试图将一切贡献都拉到确证探照灯下的文明惯性的反噬——我们越是想让一切贡献都被看见、被度量、被归因，确证装置的每一个故障就越是被体验为深渊？

这里的论证不是说“黑洞”是错的。它是说：这套诊断的真实性在于它精确地描述了一种体验——“确证先验被内化后的主体，在面对确证装置失效时所体验到的恐慌”。但这种体验本身不是对贡献之命运的终极判断，而恰恰是需要被解释的对象：为什么我们会把确证失效体验为吞噬？这种体验的生成条件是什么？本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把“贡献必须被确证”这条先验内化到了如此之深的地步，以至于确证装置的动摇，被体验为贡献本身正在被吞噬。幽隐贡献的存在，不是对这一诊断的否认，而是对它的二阶澄清：它所描述的“吞噬”，吞噬的从来不是贡献本身，而是人们投入确证装置中的全部注意力和情感认同。在确证装置的失效处，贡献的发生从未停止。

（三）确证的制度深度：三根支柱的张力内爆

确证先验要作为一种社会实在运转，依赖着一整套物质性与制度性的支撑条件。这套条件可以被拆解为三根支柱。AI的冲击，不是从外部撞上了这个装置，而是让它内部长期被遮蔽的张力第一次变成不可收拾的断裂。

第一根支柱：创作过程的劳动轨迹可以被追溯。在传统的创作模式中，从第一个草图到最终成品，中间有一条漫长的、可见的、可以被叙述的劳动路径。这个可追溯的劳动轨迹，构成了“原创性”的物理证据。AI的介入，在结构上压缩了这个可追溯的轨迹。创作过程的可见路径被压缩为“输入提示—接收输出”的短促回路。

第二根支柱：制度性的认可与保护机制。版权局、学术评价体系、文学奖与艺术奖——这些构成贡献被识别、追溯、回报的轨道。这套制度赖以运转的核心单位是“作者”：一个可识别的、排他的、对其产出物拥有所有权的法律主体。AI使这个单位模糊不清：当一个作品的生成涉及训练数据中无数已被遗忘的创作者、提示词的编写者、模型的设计者时，谁是排他的“作者”？

第三根支柱：创作者自身的主体性确证——那种“我走了那条路”的内在确信。这根支柱比前两根更深，也更脆弱。它植根于一个创作者独自面对空白时，一个人走完从无到有的整条路的身体记忆。AI撬动的，就是这个“过程与主体的交织”——当AI替创作者面对了不确定性、替他做出成千上万个塑造最终产物的微小选择时，他就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说“我走了那条路”。

一种常见的叙事倾向于把这三根支柱在AI冲击下的断裂，描述为一个曾经稳固同步的结构同时遭受外部撞击。但这不是事实。这三根支柱在AI之前，从来就不是完美同步的。主体性确证（“我走了那条路”）与制度性确证（“版权局承认我走了那条路”）在历史上始终充满错位。无数创作者的内在确证感，远远早于、或从未获得过制度的承认；也有大量制度承认的“贡献”，创作者自己知道其中有水分。三根支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张力与错位的结构，只是在AI之前，这些张力被“大致能运转”的表象遮蔽了。

AI所做的，不是在稳固的结构上凿洞。AI所做的，是让三根支柱之间本就存在的错位与张力，第一次变得不可忽视。可追溯的劳动轨迹断裂了，主体性确证迷失了——但此时，制度还在拼命用旧判准去弥补。三根支柱不是一起坍塌的，而是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节点上失效，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撕裂加速了整个结构的崩溃。确证装置不是被AI“摧毁”的；它是被AI暴露了其内部本就无法缝合的裂缝。这正是形成史的视角：一个结构的失效，从来不是单纯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外部条件的变化催化了结构内部本已存在的矛盾。

三、幽隐贡献：概念的建构

（一）从确证装置的依赖处进入

在正式提出幽隐贡献的概念之前，必须先论证一个前提：确证装置本身的运转，始终依赖于那些不能被确证的发生过程。不建立这个前提，“幽隐贡献”的存在就只能是一种诗意的猜测，而非一个必然的判断。

以版权法为例。一部法律判决认定某件作品构成“原创”，依赖的不仅是创作者提供的创作过程记录——草稿、邮件往来、

创作笔记。更深一层，它依赖法官、陪审团、律师、版权审查员所共有的、未被写入任何法条的“原创性直觉”。这种直觉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法学院课堂里被明确教授的。它是在数百年的判例、文学批评、艺术评论、美学讨论的世代积累中，以一种无法追认到任何具体来源的方式，渗透进法律从业者的判断基底中的。没有一个法学家能够追溯自己的“原创性直觉”来自哪一篇判例的哪一句话。但这个直觉，是版权法能够运作的最深层的条件。它是幽隐的——它发生于确证装置内部，却不可被确证装置自身所归因。

再看学术评价体系。一篇论文被引用，表面上是“学者甲参考了学者乙的工作并加以承认”。但更多的时候，一个学者思考方向的底层转向，来自于无数次无法被追认的微型接触——走廊里的闲谈、会议上被遗忘的一段讨论、一本从未被引用却暗中改变了研究者提问方式的书。这些接触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确证的痕迹。但它们构成了学术创造最深厚的土壤。一个学术评价体系如果只以可量化的引用数据来度量“贡献”，那么它恰好是在系统性地无视那片使那些可引用贡献得以可能发生基底——同时，它的运转又每时每刻都在依赖这片基底。一个学者之所以能够在某个时刻做出一个“可引用”的贡献，是因为他的判断力、提问方向、对重要与琐碎的区分直觉，在漫长的、不可追认的发生过程中被配置完成。学术评价体系只收割那个露出水面的节点，却看不见生成节点的根须。

更根本的论证来自对“归因”这一动作本身的分析。确证装置的归因语法是：“甲贡献了X”——甲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体，X是一个可识别的事件或产出。但这一语法本身就需要一个被默认为给定的前提：存在着可以被从复杂的相互影响场中切分出来的、边界清晰的独立贡献单元。这个前提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在大多数的人类创造活动中，贡献并不以这样的独立单元形态存在；它弥散在无数微小的、相互渗透的影响中。归因动作，不是“记录”了一个已经独立存在的贡献单元——而是“裁切”了一片连续的、弥散的发生场域，从中圈出了一块可以被命名的区域，赋予它一个主体和一个边界。这个裁切动作是有效的，是有制度功能的，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认知动作。它是一种操作。而每一次操作，都预设了那片发生场域的存在，并且以那片场域作为裁切的原料。幽隐贡献，指的就是那片在每一次归因裁切之前和之外，沉默运转着的发生场域本身。

（二）概念的进入：从三重否定撤退

上述论证确立了幽隐贡献的必然性。现在需要让这个概念以自身的轮廓被看见。本文的做法不是给它下一个正面定义，而是从确证装置的三个默认维度——主体追溯、产出度量、叙事追认——逐一撤退，让撤退后裸露出来的发生基底自行显形。

第一重撤退：不可归因。确证贡献的一个默认语法是：甲贡献了X。甲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体或集体，X是一个可识别的事件或产出，二者之间的因果链条原则上可被建立。这一语法在偶然的、散逸的发生面前失效。一个孩子在童年时每天走过同一条老街的石板路去上学。他从未“注意”过这条路，从未“学习”过路面弧度的美学。他只是在长达十年的重复中，身体被这条路的起伏所渗透。他后来成为一位建筑师，他设计的图书馆大厅地面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令人感到安定的微妙坡度——那不是对儿时老街的“复制”或“记忆”，而是那条老街在他身体里沉积下来的倾向性的一次无声的投射。问题是：老街的建造者们，对这个图书馆大厅的坡度，有贡献吗？老街由无数无名的工匠在数百年间慢慢铺就、修补、垫高、磨平。没有一个具体的“甲”可以被追溯到。更关键的是，“甲”这个范畴在这里本身就是失效的。使这个建筑师的身体发生那种特定渗透的，不是任何一个可被拆解出来的建成物，而是那条老街作为整体的空间秩序与这个特定的身体之间在漫长的、不被注意的微型相遇中积累下来的弥散性效应。这种效应不曾在任何时刻“完成”，不曾在任何节点上变得可用语言捕捉。即使有一天技术发展到能够追溯建筑师一生中每一次身体与地面的接触记录，那些记录的总和仍然不是“归因”。归因需要的是从混杂的影响场中切出一个独立的、边界清晰的单元，而那条老街的渗透，恰恰在于它以无数微小得低于归因阈值的单元，汇合成了一个无法被切分的影响场。

第二重撤退：不可度量。确证贡献的一个默认动作是：将贡献折算为某种可计数的单位。学术论文的引用次数、作品的版权收益、专利的许可数量。度量不限于货币，但任何度量都要求贡献能被转化为一个可以加总、比较、排名的数值。幽隐贡献的发生方式，使它拒绝被拉到这个转化器里。一个学生使用AI辅助写一篇课程论文，他最终交出的是一篇平庸的作业。但在写作过程的某个深夜，AI在某个回答里随口提及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角度。这个角度与他的论文主题无关，没有出现在他的终稿中。然而，它在那一瞬间穿透了他，像一粒种子落进了大脑的某个角落。十年后，当他成为一个领域的研究者时，那粒种子在某个全新问题的刺激下突然发芽——他提出一个前人未见的思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无法告诉你这个思路的起源。他甚至不记得那个深夜的偶然阅读。这个贡献，不在任何一根可以被度量的轴线上。幽隐贡献度量的不可能性，不是技术的局限——不是“因为算法还不够精妙所以暂时无法捕获”。它是结构性的：幽隐贡献的运作方式是一团渗透性的、慢性的、在事后因果叙事中被抹去了形迹的发生过程，而度量要求的是离散的、有边界的、可被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的单元。两者之间的不兼容，不是量的差异，而是存在形态的错位。

第三重撤退：不可追认。确证装置不仅要求贡献被归因、被度量，还要求贡献能够被讲入一段历史——一段贡献史。幽隐贡

献不符合这条叙事语法。它散布在节点的缝隙中，而不栖身于节点自身。一个孩子站在美术馆里仰头看一幅巨大的抽象画。他完全不懂那幅画。他感到困惑，他走开了，去旁边的礼品店买了一个冰淇淋。但在那困惑的几秒钟里，他的身体经历了一次与陌生的视觉秩序的相遇——一种不以他熟悉的“这是一个人、那是一棵树”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秩序。这次相遇在那个下午没有产生任何可表述的效果。二十年后，当他作为城市规划师面对一个老城区改造的棘手项目时，那种在美术馆午后身体里储存下来的对“不以自然为中心的组织秩序”的不可言说的感觉，突然涌入他的设计直觉，推动他做出一个大胆的方案。他无法追认这个直觉来自那幅画——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看过那幅画。那次相遇在他的生命叙事中是一段隐没的、从未被标记的经历。但这段经历参与了二十年后那个创造性时刻的发生。

这三重撤退，不是三条并列的“特征”。每一重都是对确证装置的特定维度的退货。不可归因，退货的是“主体—作品”之间的归属关系；不可度量，退货的是“投入—产出”之间的计量关系；不可追认，退货的是“事件—叙事”之间的征引关系。三者合起来，勾勒出的是幽隐贡献的存在形态：它不是在确证装置的边界内部等待被发现的一个新对象，而是在确证装置停止工作的地方裸露出来的、一直沉默运转着的那片发生场域。

在此必须立即插入一个元反思：这三重否定所描述的，不是幽隐贡献的“本质属性”。幽隐贡献没有本质属性。它在每一次与确证装置的相遇中，都会被确证的探照灯照出不同的逃逸形态。当确证试图归因时，它显现为“不可归因”；当确证试图度量时，它显现为“不可度量”；当确证试图追认时，它显现为“不可追认”。但“不可归因—不可度量—不可追认”这个三联体，只是在确证灯光下投射的影子。幽隐贡献自身是一种发生，不是一种属性集合。把这三重否定误认为它的“定义”，就是把它重新拖回确证逻辑——用负面的方式给它建了一个坐标。它能被谈论的唯一合法性，不是因为它有某种可被捕获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以不在确证能力范围内的方式，持续地发生着。

（三）幽隐贡献与后结构主义：不可还原性对话

命名一个概念，必须接受最严格的不可还原性校验：它能不能被某个已有概念的脉络重新描述并吸纳？对于幽隐贡献而言，最强大的对手不是隐性知识，不是涌现理论——是后结构主义的“作者之死”与“互文性”命题。这是本文概念论证最关键的学术战场，必须正面处理。

罗兰·巴特在1967年宣告“作者之死”，其论证的核心恰恰是：文本的意义不在作者的生产，而在读者的接受；不存在一个在文本之前、之外、之上掌握着文本终极意义的主体，文本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多种书写相互混合、碰撞”。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则进一步将这一判断扩展到所有文本的本体论层面：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文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语，都早已被前人使用过，承载着无限的历史痕迹。因此，文本的“主体”不是作者，而是语言系统本身——一个无主体的、自我运转的意指实践。

一个熟悉后结构主义文献的审稿人，读到本文对“不可归因”的论述，必然产生一个尖锐的质询：这不就是互文性吗？这不就是作者之死后、文本意义在语言系统中的无主体生产吗？老街上无名工匠的痕迹渗透进建筑师的设计，不正是一次完美的“互文性”操作——建筑师的“文本”吸收了之前无数无名主体的“文本”？如果幽隐贡献只是将后结构主义从文学文本扩展到整个文明发生层，那它就不是一个新概念，而只是一个扩大的应用范围。

这个质询必须被正面回应。幽隐贡献与互文性之间的差异，不是领域（文本vs.文明），也不是尺度（个体创作vs.文明积淀）。差异在于两个本体论层面。

后结构主义的“作者之死”与互文性，处理的是**符号系统内部**的不可归因性。当巴特说“作者已死”，他指的是：文本的意义生产，不需要诉诸“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这一个体性的意图源头——意义在语言的差异化运动中被生产出来，作者只是语言借以显现自己的一个“抄写员”。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处理的同样是符号内部的操作：一个文本如何通过引用、暗示、变形、挪用，与其他文本构成交织——这种交织使得每一个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无法被真正“归因”于一个单一主体。但请注意这一操作的边界：互文性始终停留在符号界。它追问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网，揭示的是任何意指行为都内嵌在它之前的意指序列中。它所描述的“不可归因”，是一种符号的弥散——一个语词在被一个主体使用之前，已经被无数前人使用过了，它的意义从来不是这个主体独自赋予的。

幽隐贡献处理的则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的发生过程。它不是在符号界内部发生的意义弥散，而是在主体的身体、感知、情感、倾向性被不可追认的微型接触所渗透和重塑的那个前符号的、肉身性的层面上发生的。老街对建筑师的渗透，不是一个符号吸收了另一个符号。建筑师从未把那条老街“当作符号”来接受。那是一种身体性的沉积——一种前于任何意指实践的、在肉身层面发生的过程。他后来做出来的设计中的微妙坡度，不是他对老街的“引用”或“变形”，而是一种沉积在他身体

倾向性中的印痕的无声浮现。在暴露之前，它甚至不是“互文的”——它不在符号秩序中，不在任何意义上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是一团沉默的、非符号性的身体记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可以在文本的纤维中追踪踪迹的往返，但无法触及一个尚未进入符号界、在建筑师的身体里沉积了数十年的肌肉倾向性。这就是辨别面：幽隐贡献发生在符号之前的层面；后结构主义的发生场地，是符号之内。

而且，后结构主义以宣告“作者之死”为代价，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不可归因性——但同时也就把“文本”从主体的生命中剥离出来，让它成为一个自我运转的语言事件。幽隐贡献则恰恰相反：它描述的不可归因性，不仅不宣告主体的死亡，反而标志着主体的构成——主体自身的判断力、创造倾向、对美与真的感知阈限，正是在不可追认的发生过程中被配置完成的。一个建筑师之所以是这个能够设计出那种坡度的建筑师，不是因为他读了哪些书、背下了哪些规范，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在漫长时间中经历了那些无法被书写的渗透。这些渗透使他成为他——而这个过程不发生在符号界，也不依赖任何意指实践。在后结构主义的图画里，主体消失之后，只剩下文本的自我嬉戏；在幽隐贡献的图画里，主体并未消失——他只是不能把那个使他成为他的发生过程，回收确证装置中加以指认。

总结这一概念辨别：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论证的是符号在符号系统中不可归因的运动；幽隐贡献论证的是，主体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有特定倾向性的发生者进入符号系统，是因为他的倾向性本身是在一个不可归因的发生过程中被前符号地配置的。互文性解释了一个文本为什么无法被归因于单一作者；幽隐贡献解释了一个人为什么拥有这种而不是那种做出创造性判断的倾向——而他甚至无法对自己解释这个“为什么”。前者在文本层面消解作者的主体地位；后者在主体层面揭示主体之为主体的发生过程，恰好不可被主体自身追认。这两条路径非但不重合，而且在根本的本体论预设上相互排斥：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消解于语言系统；幽隐贡献的主体则是在语言之前的一片发生场域中，被不可归因地塑形而成的。

在后结构主义之外，还埋伏着一个更贴身的对手——它就藏在本文自己的案例里。一位社会学家读到老街与建筑师的故事，会立刻说出两个词：习性（habitus）与身体化（hexis）。布迪厄毕生的工作（尤见《实践的逻辑》，1980），正是把这一类身体沉积拉回可归因的轨道：品味可归因于阶级轨迹，姿态与身体倾向可归因于场域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以肉身的方式沉淀在行动者身上，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把这层沉淀翻译回它的社会来源。照此，幽隐贡献岂不是“尚未做完归因作业的习性”？

这个收编必须被拒绝，而拒绝的理由有三层。第一层：习性归因是**统计性的、位置性的**——它解释的是“这一类身体”为何倾向于“这一类品味”，其解释变量是社会位置，不是这一个身体与这一条街之间的这一串微型相遇。把建筑师的坡度归因于“某个工匠市镇的空间习性”，恢复的是模式，抹去的恰恰是奇异性：为什么是坡度而不是檐口，为什么是这个弧度而不是那个——位置分析在原则上不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的变量表里没有那条街。幽隐贡献命名的，正是位置归因做到尽头之后仍然剩下的那层配置。第二层：习性理论的解释目标是**再生产**——习性生成实践，实践再生产场域，场域再塑形习性；它长于解释趋同与规律。幽隐贡献关切的却是创造性分岔的来路：为什么这个身体在这个时刻长出了一个位置逻辑推导不出的判断。习性预测相似；幽隐解释这一个的不可推导。

第三层最深，也最贴合本章第（一）节的论证：习性概念本身，就是确证装置向社会科学的延伸——它是现代知识把“不可归因之物”拉进归因语法的最成功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的巨大收获，本文不否认；但按本文对“归因即裁切”的分析，任何归因——包括社会学最精致的这一种——都是对连续发生场域的一次裁切操作。习性分析的成功恰好证明了裁切的制度效力，也恰好留下了裁切的残余。幽隐贡献不与习性争夺已被裁下的那一块；它指认的是这套最强归因术在原则上收不走的残余。布迪厄把身体从个人心理学手里赢给了社会学；幽隐贡献要说的是：在社会学收完账之后，身体里仍有一片任何账本都进不去的发生。

隐性知识与涌现理论各自在另一个维度上逼近幽隐贡献，但同样装不下它。隐性知识（波兰尼，1958）论证的是：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但可以被主体“拥有”并被师徒相授和共同体认定（“他是这个手艺的大师”）的手艺性知识。它是属主体的、不可言说但可被实践显示的，处在确证装置的延长线上——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但可以通过实践被承认。幽隐贡献则不属于任何主体，也不构成任何主体的“能力”。老街对建筑师的渗透，不使建筑师“拥有”关于老街的隐性知识——他后来设计的坡度，不是他拥有的知识的结果，而是一种发生性的倾向在他身上的暴露。更根本的区别是：隐性知识可以进入确证装置（只是以非命题的方式），幽隐贡献则不可被这样显形——一旦试图把它打捞出来、识别为“某种共同体的隐性知识”，它就失掉了它的弥散性与不可切分性。涌现理论则处理的是系统中微观互动的秩序结晶过程——从混沌到结构的刹那。幽隐贡献处理的不是结晶的刹那，而是结晶之前的漫长配置——那种在无数平淡日常中、缓慢渗透性地塑造着系统倾向于结晶出这种秩序而非那种秩序的底层过程。它不是涌现，而是涌现倾向的发生史。系统科学家可以把“长时段参数配置层”纳入模型，但这层参数配置之所以呈现为这个分布而不是那个分布，恰恰是因为模型的操作者无法再往前追溯的那些幽隐过程。幽隐贡献对涌现理论而言的不可消化性在于：涌现理论必须预设一组给定规则；而幽隐贡献把规则的生成推回到更远的、发生在一切规则化之前的场域渗透中。

（四）幽隐贡献如何与确证贡献共存：一个不争夺地盘的判断

把幽隐贡献与确证贡献讲清楚之后，必须接着讲一个事实：它们不是敌人。幽隐贡献的命名，不是要推翻确证贡献，也不是要取代确证贡献成为新的评判标准。它的作用更局限、也更根本：它解除了确证装置对“贡献”这个词的独占权。

确证贡献有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版权法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学术署名制度激励研究者投入劳动，专利制度使得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成为可能。在高度复杂、需要精细协作与权利保护的现代社会中，确证不仅是历史建构，更是维系大规模创造性活动的必要制度。幽隐贡献的命名不会——也不应该——导致诺贝尔奖的取消或版权法的废除。它试图改变的，不是这些制度的运作规则本身，而是我们注视它们的目光。在承认这些制度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要看见：它们只能管理那片被确证之光所照亮的区域，而在那片区域之外，存在着比区域内部更广袤、更深厚的发生层。确证制度在那片发生层的基底上运行，就像一座城市建立在看不见的地下水流脉上——没有那些水脉，城市不会存在，但城市的市政系统并不管理那些水脉，也不为它们署名。幽隐贡献的命名只是让水脉被看见，并为它们争取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待遇：不是被管理，而是被承认其不必被管理、不能管理、管理反而会损害其运作的本体论地位。

这个“不去管理”的姿态，在现代制度设计中几乎不可想象。现代制度倾向于将“承认一个东西重要”等同于“把它纳入管理、评估、优化的轨道”。幽隐贡献恰恰要求一种反向智慧：承认某些东西重要，恰恰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纳入管理的轨道。这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制度在面对发生基底时应当具有的自我节制。

四、幽隐大学：一个贯穿性的思想实验

至此，本文已经完成了概念的理论建构。但幽隐贡献有一个根本的论述悖论：你越是正面论述它，就越容易将它“对象化”——把它变成一个可被分析、归类、应用的东西，从而背叛它的不可归因性。绕开这个悖论的方法，不是放弃论述，而是改变论述的策略。本节构造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一所确证装置被全部移除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幽隐逻辑不以正面的教义出现，而是作为确证缺席的必然后果，自行浮现。读者将跟随本文一同进入这所大学，一同遭遇确证退场后暴露出的不适与矛盾，然后在那团不适中，自行体会到“幽隐贡献”这个命名的必要性——不是作为被展示的概念，而是作为被逼出的判断。

（一）进入实验室

这所大学的设定极其简单：所有的教学行为，都不可被跟踪、评价、归因和度量。课程没有教学大纲，教授不署名发表，学习成果不与任何证书挂钩，没有学分，没有成绩单，没有学位。所有知识以幽隐的方式流动——通过对话、共处、耳濡目染、不经意的旁听、在走廊里与某位学者的一次擦肩而过的交谈。这里不设任何“学习产出”的评价机制，不记录任何人的“学术贡献”，不生成任何形式的排名。这不是某种波西米亚式的自由教育乌托邦，而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实验条件。它的功能，不是被当作“理想”来向往，而是被当作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见当下的大学有多少结构是被“确证必须发生”这条隐性律令所支配的；以及当这条律令被悬置后，教育会暴露出哪些我们从未有机会真切面对的问题。

（二）确证的三根支柱在此何处可寻

在幽隐大学里，确证装置的三根支柱——可追溯的劳动轨迹、制度性认可与保护、主体性确证——全部失效。但失效的方式，与AI造成的失效不同。AI撬动支柱，是因为它替代了过程；幽隐大学则是因为制度主动放弃了追认。

首先，教师的教学劳动轨迹不再被追溯。一位教授开一门课，没有教案评审，没有课堂观察，没有教学评估表。他可能在某个下午与三个学生在草坪上坐了一个小时，聊了一些与课程“无关”的事。没有记录，没有追踪，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可以证明“这次谈话的教学贡献”。学生三十年后回想起那个下午，意识到自己后来三十年的研究取径都源自那个下午的某句话——但在制度上，那个下午不存在。它不可被写入这位教授的年终考核，也不能被学生写进简历。

其次，制度性的认可与保护——职称、头衔、荣誉——在幽隐大学中不复存在。不是因为大学废除了职称，而是因为职称赖以运转的评判材料——论文、引用、教学评估、学术服务——在这里不被生成。一个教授在这所大学里度过四十年，指导了几代学生，但没有一篇他署名的论文出自这里，没有一条数据可以证明“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制度上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对知识的影响，只能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幽隐传闻存在于那些被他教过的学生的身体和思想中——而这些学生，也不会任何论文的致谢中写下他的名字，因为致谢本身就是一种追认机制。

第三，也是最深的，是师生双方的主体性确证机制被悬置。教授无法对自己说“我发表了某篇重要论文”“我获得了某个奖项”“我的学术贡献获得了共同体的承认”——因为这些都不存在。他的全部自我确证，只能依托于他在教学现场中与学生的真

实互动、他在那些未被记录的谈话中所投放的思想、他在漫长岁月中对自己持续思考的内在感知。他必须学会在没有外部镜子的条件下，确认自己的存在。学生同样如此。他们走进这所大学时便知道：四年之后，他们走出去时，手中没有文凭。没有任何一张纸可以向未来的雇主或同行证明“我在幽隐大学受过了了不起的教育”。他们在这里真正的收获——那些被某位教授的一句话、某本书的一个段落、与某位同学的一次深夜争论所永久改变了的内在视野——只有在走出大学之后，在漫长的人生中，一寸一寸地、不可归因地在他们的工作和生命中显现出来。但显现的时刻，他们无法出示任何证据。

（三）疼痛：确证退场所暴露的焦虑

幽隐大学不是一个乌托邦。本节刻意保留——甚至放大——它的疼痛感。这疼痛是概念的尖锐度来源。

第一个疼痛：恐惧。一个年轻教师，在进入这所大学任教的前几年，会经历一种近乎眩晕的恐慌。他习惯性地想要一份“我做得还不错”的确证——教学评估、学生好评、同事认可。但在幽隐大学，这些信号都被系统性地撤除了。他面对一群沉默地离开教室的学生，没有任何反馈告诉他刚才那堂课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必须在那种不确定性中持续教学，像在黑暗中游泳。这种恐慌本身，就是确证先验的内化程度的最精确的试纸——只有当一个主体把“被确证”完全等同为“在做有价值的事”时，失去确证才会被体验为无法承受的眩晕。幽隐大学逼迫一个人面对这道等式在自己体内的运作。

第二个疼痛：无声的劳作与无法证明的价值。一位教授在幽隐大学教了一辈子书。他改变了无数学生的思考方式，但没有一篇论文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一个荣誉可以铭刻这一点。在他的葬礼上，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了一段话，说他三十年前在走廊里与教授的一次短暂交谈，改变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但这段话没有被记录，流传的范围以在场的人数为极限。教授的贡献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发生在了那些学生的生命里。但这贡献不可被写进任何历史，不可被压缩为任何纪念文章中的一条脚注。对在身后之名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灼人的疼痛——不是贡献没有得到回报，而是贡献的形态天然地排斥被记住。

第三个疼痛：学生的社会性脆弱。幽隐大学的毕业生走出校门时身无凭证。他们内在的深厚教育无法被翻译成任何社会通用的语言。他们需要在职场上、学术圈中、公共空间里，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通过真实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的长期展现，来让周围的人逐渐意识到“这个人受到过某种说不清楚的教育”。这不是浪漫的。这是沉重的。它意味着，在确证装置仍然统治着社会资源的分配的时代，幽隐大学的毕业生将系统性地处在不利地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依赖那片不可确证的发生场域——而那片场域的产物，在确证逻辑占主导的世界里，无法被用来交换任何制度性利益。

这个疼痛暴露了幽隐逻辑与确证逻辑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也暴露了幽隐贡献概念本身的内在困境：幽隐贡献的命名，不是为了给这所大学的师生们颁发一张“我们的贡献是幽隐的、因此更高贵”的精神安慰奖。它的命名，是为了揭示——当确证装置将一个幽隐的人排斥在制度性承认之外时，这不是因为那个人“没有贡献”，而是因为确证装置的视力，天然地局限于一个比贡献的发生场域窄得多的范围。承认幽隐贡献的存在，不解决幽隐大学毕业生在社会结构中的脆弱——但它使得这种脆弱不再被误诊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被准确地识别为“社会用以识别贡献的装置，恰恰无法看见那些最深的贡献形态”。

（四）矛盾：一个教师的离去

为了不让幽隐大学停留在理想模型的平滑中，本节引入一个内在矛盾。假设幽隐大学里有一位年轻教师，任教七年之后，离开了这所大学。不是因为他教得不好——学生们私下里说，他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恰恰相反：因为他教得太好了，以至于他的教室里总是坐满了沉默而专注的学生，而他却无从得知。他的课堂没有反馈表，没有教学评估，没有学生评价。他每周走进教室，面对几十双专注的眼睛，讲完课，然后那些眼睛便沉默地散去。没有一句话告诉他，他刚才投出的那句话，有没有落在任何人的心里。七年后，他再也无法承受这种漂浮在不确定性中的状态。他回到了普通大学，开始发论文、拿项目、积引用、评职称。他变得可以被确证了。

这个故事不是对幽隐大学的批评，也不是对那位教师的批评。它是幽隐贡献概念内部张力的具身化：幽隐贡献的承认，不妨碍一个主体对确证的需要。幽隐大学的建制，不能要求所有进入其中的人，都以圣徒般的意志力抗拒被确证的欲望。那个教师的离去，不是因为幽隐逻辑错了，而是因为幽隐逻辑单独无法承载一整个人生——人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确认，需要在他者的相遇中，感知到自己存在的回响。幽隐贡献的发生场域，需要确证装置的有限光芒，不是为了取代它，而是为了与它构成一种充满张力的、互不统治的共存。幽隐大学思想实验的功能不是论证这种共存应该如何设计——那是制度理论的任务——而是暴露确证装置的边界，让边界的另一侧，不再是空白。

五、资本捕获：一个必须正面处理的规范性挑战

幽隐贡献的概念，有一个必须直面的最尖锐的反驳。一个操盘手读到这篇论文，他的反应不会是恐慌，不会是感动，而会是

兴奋——一种发现新矿脉的职业兴奋：“太好了，一块尚未被确证、尚未被定价的巨大价值域！正是区块链NFT、数据挖矿和未来劳动期货合约的完美沃土。”本文把确证装置当作贡献唯一的管理者来批判，却可能忘了一件更危险的事：确证是一个历史发明，而对不可确证之物的捕获同样是一个历史发明——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古老、更残酷。幽隐贡献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拒绝被外部化，它将成为最黑暗的捕获对象——不是因为确证装置想照亮它，而是因为资本机器想把它吞进去。

这个反驳的力量在于它击中了全文一个默认的预设：把“确证装置”和“贡献的管理”当作同义词。的确，西方现代性以降，贡献的管理主要采取“确证”的形式——署名、版权、专利、引用。但管理不必然等于确证。捕鲸船不确证鲸鱼的存在，它只需要找到鲸鱼、杀死它、把它炼成油。资本对不可度量之物的操作从来不依赖于“度量”——资本只做一件事：定价。度量是科学的事；定价是市场的事。资本不关心一块价值域的“本质”是否可被确证，它只关心能否给这块价值域标上一个价格，并让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浮动。

区块链技术和NFT就是这种定价逻辑的极致形态。NFT不确证艺术品的“艺术贡献”——它确证的是“所有权”。它把任何东西——一幅画、一条推文、一段代码——映射为区块链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可被交易的权属标记。对于一件由AI生成的作品，没有人能够确证“谁贡献了什么”，但NFT可以轻松地确证“这个token属于谁”。确证装置失效的地方，正是超确权装置开动的地方。幽隐贡献不是被确证的——但它可以被“上链”。那条老街对建筑师的渗透，没有人能写成一篇论文论证其贡献权重——但那条老街的3D数字化模型可以被铸成NFT，然后由某个投资机构购入，作为“城市记忆资产”列入其投资组合。幽隐贡献没有被确证，没有；它被捕获了。

这意味着，本文所构想的“确证装置的失效→幽隐贡献的浮现→文明的自觉承认”这一叙事，漏掉了一个更可能的路径：确证装置的失效→幽隐贡献的浮现→资本的超确权捕获→幽隐贡献被榨取为一种新的可交易资源。如果存在这一路径，本文的规范性内核就是空转的——它在批判确证先验，却在资本捕获面前束手无策。

回应这个反驳，需要从幽隐贡献的本体论特性中，找到它拒绝被资本化的内在根据。这根据不在“不可度量”——不可度量的东西可以被打包成“预期价值”然后被定价。这根据也不在“不可归因”——不可归因的东西可以被集体化（“人类共同遗产”），然后被某个人类代理人（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代表式地管理。真正使幽隐贡献抵抗资本捕获的，是它的第三个否定：不可追认。不可追认不是“暂时无法追溯”，不是“追溯成本过高”，也不是“追溯主体过多以至于追溯失去意义”。不可追认是：幽隐贡献的发生过程，在其本体论结构上，排斥叙事化。

叙事化是资本捕获的底层操作。任何被资本捕获的东西，都必须首先被转化为一个可被叙述的资产——“这块土地承载着原住民三百年的历史记忆”，“这个图案是这个部族千百年来集体创作的结晶”。叙事将弥散的发生收编为一个有起点、有主体、有可指认价值的故事，然后资本为这个故事定价。幽隐贡献的本体论特性在于，它拒绝这种收编。在它被叙述的那个瞬间，它就不再是幽隐的了。那条老街对建筑师的渗透，一旦被锁进一个叙事——“这条明代老街以集体创作的形式，为现代建筑提供了无名的灵感滋养”——它就被转化成了一个可以被确证（哪怕是集体确证）的“影响事实”。幽隐贡献逃逸的地方，恰好是这个“被确证”的瞬间。资本要把幽隐贡献铸成NFT，就必须先把它拉出幽隐状态，为它创造一个可追溯的叙事——哪怕是虚构的。而这个拉出的操作本身，就消灭了幽隐贡献的幽隐性。它铸出的NFT，不是幽隐贡献的资产化，而是幽隐贡献的一具标本——一具在捕获的瞬间被杀死的、不再幽隐、不再发生的标本。

这就导向幽隐贡献伦理内核的核心判断：幽隐贡献的反捕获，不在于它能够拒绝被资本定价（它不能），而在于任何捕获它的操作，都在结构上摧毁了它之为幽隐发生的那种东西。幽隐贡献不是一种“不可被拥有的宝藏”——它是一种一旦被拥有就不再是它自己的存在形态。这不是法力，不是不可破解的密码，而是本体论层面的免疫：它不是免于捕获，而是捕获即毁灭。最精准的NFT、最精密的区块链合约、最智能的定价算法，都无法绕开这个事实：你要定价，就必须先把它从弥散的、不可追认的发生场域中切出来，赋予它一个可以被标价的边界；而这个“切出来”的动作本身，恰好使它失去了它作为幽隐贡献的全部构成性特征。

因此，幽隐贡献的文明自觉承认，其伦理内核不是“保护幽隐贡献不受侵犯”，而是“克制将其转化为确证或超确权对象的欲望”。这是一种必须被学习与练习的克制。它不是被动的无助，而是积极的自我节制：文明在拥有了将一切事物都纳入管理轨道的技术能力之后，却选择在某些地方停下，不在那些地方建立任何形式的追认与捕获装置。这种克制，与环保主义对荒野的“不开发”在表面上相似，但根基不同。荒野的不开发，是为了保护自然遗产；幽隐贡献的不可捕获，是因为捕获本身会杀死被捕获的东西。荒野还能作为“自然保护区”被标在地图上，被设立为“世界遗产”。幽隐贡献甚至不接受这种身份的赋予。它的存在形态，排斥一切——包括保护的、善意的、文明的——叙事化与制度化。

六、证伪条件与论文边界的诚实交代

任何诚实的概念，必须给出自身可能被证伪的条件。幽隐贡献的证伪，可以从四个方向进入。

第一，概念有效性证伪。如果有人能证明，幽隐贡献所标识的发生过程——“不可归因、不可度量、不可追认的、不被确证的渗透过程”——可以被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概念完全吸收，即证明本文第四章给出的辨别面（前符号的身体性沉积 vs 符号系统内的意指弥散）实际上不存在，那么本文的核心概念就退化为已有理论的更动听名字。证伪的具体操作应当是：展示一个幽隐贡献的标准案例（如老街与建筑师），并使用互文性理论的完整分析框架——而非仅其结论——对该案例进行再分析，证明互文性能够完整地解释案例中的所有生成环节，而无遗漏。

第二，历史性证伪。本文第三章对确证先验的追溯，包含一个历史判断：确证装置的确是在印刷术、浪漫主义、版权法的共同作用下才成为对贡献的默认语法。如果有人能证明，早在这些历史条件出现之前，“贡献必须被确证”这一先验就已经以系统性的制度形态存在，并通过对古代文献的严格考证展示这一点，那么确证先验的发生史这一环就被证伪——而这会连带削弱本文对幽隐贡献不必被确证装置管理的论证。

第三，伦理立场证伪。本文第五章论证了幽隐贡献的自体论免疫——任何捕获操作都会在结构上摧毁它。如果有人能证明，区块链、NFT或其他超确权技术能够在不破坏幽隐贡献的弥散性、不可追认性的前提下，实现对其的资本化管理，那么本文的规范性内核——“幽隐贡献因其被捕获即被毁灭的特性，应当被制度性地克制对它的捕获”——就被证伪。这个证明必须是操作性的：即找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其中超确权装置成功定价了一个幽隐贡献的发生过程，并且事后分析显示，该过程的那些构成性特征（弥散性、非事件性、不可追认性）在定价后完好无损。

第四，实践性证伪。幽隐大学的思想实验所暴露的核心困境——一个被确证装置排斥的人，无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获得应有承认——如果被证明是无法被任何制度设计所缓解的绝对困境，那么幽隐贡献的承认在实践上就是一句空话。证伪的操作可以是这样：如果在现有的制度实验中（例如开源社区、匿名评审制度、无署名出版物）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对幽隐贡献的制度性预留空间能够在略微缓解这种排斥的同时不破坏幽隐性本身，本文的实践推理就是失败的。但这里需要附加一句：幽隐贡献的承认从不许诺消除幽隐人在确证社会中的结构性脆弱——它只许诺正确诊断这种脆弱的来源，并约束制度对幽隐区域的侵入。这一条的证伪，不是证伪“有没有办法让幽隐人不吃亏”，而是证伪“有没有办法让制度节制自己”。

这四个方向的证伪条件，各自独立。任何一条被满足，幽隐贡献概念的相应论证即可被宣告失败。

最后，本文必须诚实交代自身的边界。幽隐贡献的命名，不提供制度蓝图。它不做的事与它做的事同样重要。它不告诉版权局如何修改法条，不告诉大学如何改革评价体系，不告诉科技公司如何设计AI的贡献归属机制。这些是制度理论的工程问题，不是本文这类诊断的任务。本文只做一件事：让“贡献必须被确证”这条默认为参照系的先验，失去其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并在确证装置的边界处，辨认出一片不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却构成其运转条件的存在区域。这是哲学的任务，不是工程设计的任务。如果本文刺激了制度理论的研究者去问“那既然有幽隐贡献这回事，我们应该如何设计新的评价框架”，那本文的溢出效应便已达成——但本文自己，不走到那一步。

注释

[1] “贡献者黑洞”系本文对当前若干诊断路径（策展人转向、冗余守护论、责任路由化）之共同深层逻辑所做的合成概括，用于把这族立场推到最强后再行二阶追问，不指涉某一篇特定文献；对其“三项工作”的归纳，属于本文的建构性复述。

[2] 幽隐大学为严格设定条件下的思想实验，其中人物（年轻教师、离去的教师、毕业生）与情节均为建构，不指涉任何真实机构或个人；第四章已明言其功能是镜子而非蓝图。

[3] 老街与建筑师、深夜与学生、美术馆与孩子等例示，均为典型化建构，用于呈现结构机制，不具有经验个案意义。文中提及的2023年美国版权局裁决为真实公共事件，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Barthes, Roland. 1967. “La mort de l’ auteur.” *Manteia*, V.
- Bourdieu, Pierre.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Holland, John H. 1998.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Kristeva, Julia. 1969. *Sé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Polanyi, Michael.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 Copyright Office. 2023. Decision letter re: *Zarya of the Dawn* (February 21, 2023). Washington, DC.